

赵剑英

## 1.交往主体形态的新变化

在当代社会，交往主体除了传统的民族国家、集团群体、企业学校、个体以及大量的民间组织外，出现了新的重要的交往主体形态。

(1) 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主体的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在民族国家交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在市场和生产上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过程。它促进人力、资本、商品、服务、技术和信息实现跨国界的流动，优化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许多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已超过了一些中等国家的经济实力，跨国公司的活动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和力量，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由此也越来越密切，以至于有人提出，跨国公司而不是主权国家，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化生产的组织者。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中最重要的基础和载体，把全球化浪潮推向了世界各地。

(2) “全球利益”的形成与非政府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凸显。

由于全球化使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上紧密关联，导致诸如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热核威胁、生化武器、疾病流行等关系人类生存安全的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跨国问题或曰全球化问题大量出现，以致一些政治学家提出了“世界公民权利”、“世界公民社会”、“世界国家”、“全球治理”等一系列新的政治概念，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观点的含义及用意不一，有的值得商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时代，国际性组织的作用将日益增强，国际调节与协调越来越重要，超国家的世界经济组织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强，主权国家将不得不接受国际组织的安排与裁决。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性质和能力正在改变，国家主权日益受到削弱，国家追求国家利益的方式和方法正在改变，国家的国内和国际事务趋于合流，国家的许多职能正逐步被社会组织化。（参见余永定；叶江）全球化正冲击着传统的乡土观、民族观、国家观，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 2.交往客体的信息化和数字化

最能说明人类实践对象的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有两大现实，一是数字地球的出现与应用，二是数字图书馆的来临。

人类赖以生活的地球正日益“数字化”了。数字地球也就是信息化的地球。信息化的地球是一种地球信息模型，它把地球上每一角落的各种信息都收集起来，按照地球上的地理坐标对它们进行加工整理，建成一个完整的信息模型。利用这种信息模型使用多媒体数据，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仅能从微观的角度对地球上每一点作详尽了解，还能从宏观的角度了解地球的整体情况。

“数字化地球”作为人类重要的认识对象，将对人类更科学合理有效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参见陈幼松）

由此看来，人类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对象将越来越多地被“数字化存在”和“信息化存在”所取代。有人认为互联网还只是一个“儿童”，人类生活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才刚刚开始。21世纪人们将真正进入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参见方舟子）。

## 3.交换方式和手段的智能化

计算机和全球通讯网络组成的国际互连网络已成为人类工作、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的交往工具。计算机系统的含义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计算机系统是指计算机的网络结构，计算机系统即是网络计算机。专家预测，21世纪，全球互连网的规模和能力可能扩大数倍，甚至数百倍。每一台计算机都将成为整个网络系统上的一个智能主体，多主体技术和分布式技术的应用，使人们处于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在信息社会，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全部内容之一就是如何处理、筛选有用的信息，并进行正确的决策。在当今和将来，人类的所有活动都不可能离开信息，人们每天的工作、生活将依赖于对计算机网络信息的收集、加工和处理。经济交往是人类交往生活的基础内容。电子商务实现了经济交往的里程碑意义的变革。在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企业单靠传统手段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已经远远不够了。借助于互连网络，运用电子商务手段改善经营、开拓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已被全球大公司认为是成本最低而效率最高的方式。电子商务经济交往方式的迅速发展，将给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带来巨大的变化。

## 4.交往时空观的巨变

当代科学技术革命所提供的大容量、高速度的现代化交通运输和信息通讯工具使人们冲破了地域的阻碍，交往时空观发生了巨变。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认为：“全球化指的是在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觉到的、人们的日常行动，日益失去了国界的限制。按照这种理解，全球化指的是空间距离的死亡。人们被投入往往是很不希望、很不理解的跨国生活形式中。根据安东尼·吉登斯的解释，这是超越空间距离(由不同民族 国家、宗教、区域、大陆组成的似乎是相互隔绝)的世界。”（转引自张世鹏）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初濑龙平认为，“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被压缩”是全球化的一个特点。得益于电信和交通技术的革命，我们的生活更多地依赖与他人的活动，与外界的联系无论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更加紧密。（参见初濑龙平）以上对全球化的看法不尽相同，但都认同全球化的影响已渗透到民族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人的认识和活动空间国际化、世界化了，以至出现了诸如“地球变小了”、“地球村”、“世界社会”这些说法。这表明全球化超越了地域空间的限制，人类交往空间大大扩展，已创造了一种“流动的生存空间”。

这种空间一是由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经济全球化主要体现为资本全球化、产品全球化和通讯全球化。这些现代的经济要素日益要求

冲破民族国家的壁垒，使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自由流动，要求一个相应的全球性的流动空间，这个全球性的流动空间就是世界市场或全球市场。曼纽尔·卡斯特认为，传播新体系和信息新技术的信息发展模式正造成“从空间地域（places）到流动和渠道（flows and channels）的转变，这就等于消除了地域对生产消费过程的影响”。他认为，企业的信息网将巩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与一体化，变世界性装配线的可能为现实，开辟真正的全球市场。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基本不受地域影响的世界秩序，该秩序连接于少量“集中的知识生产和信息存储中心以及图像信息发散中心，中枢集中于世界工业体系的控制系统网络、指挥、控制总部”。（参见莫利）

二是由于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使网络交往成为人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人类的生存空间除了物理空间外，又开辟了新的空间即网络空间或虚拟空间。世界真正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压缩，实现了交往的世界化和紧密化。全球性传播霸业迅速崛起，诸如默多克、贝塔斯曼建立的帝国。这些巨型企业在一条全球流水线上完成合资共同制作的产品，并瞄准世界市场，从而构筑全球图像流动空间。

## 5. 从交往形态的新变化看当代社会的新特征

### （1）社会运行机制的新变化与风险社会的形成。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趋势的迅速发展，使人类交往的迅时性、关联性、互动性、开放性大大增强，交往的效率大大提高，交往的成本大大降低。可以说，信息运动已成为物质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基本方式，这将进一步促进人类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互补互促效应以及各自效率的提高，表明了社会的进步。

但另一面也不容忽视，即由于信息运动已成为物质运动、社会运动的基本方式，人类交往日益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各类社会主体间和社会事物间的关联性、互动性、开放性和即时性大大增强，人类社会运行状态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也因此增强。比如，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金融资本流动信息化，银行资本、证券资本的流动在空间上日益扩大，在速度上日益加快，这虽然可以增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从而促使金融资本更加自由化和全球化，但也意味着金融投机的全球化、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曾经在多个地区发生的金融风暴及由此引起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就是明证。也就是说，国际金融危机具有“传染效应”。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讲，世界经济和政治变得很脆弱（参见余永定）。彼得·德鲁克则认为，知识社会特有的劳动组织将成为“破坏稳定的因素”。这首先表现在企业的稳定性受到极大的挑战。在知识和技术不断创新的时代，企业行为必须随知识和技术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将自取灭亡；企业的管理将越来越成为对于变化的反应能力而不是对于企业的静态结构进行改良，以至于企业成为“变色龙式的组织”。在这种组织自身的稳定性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由大量的此类组织构成的社区、社会的稳定性就难以保证。知识社会的组织“就这样不断破坏社区，使之混乱和不稳定”。（参见德鲁克，第63页）。

当代社会的不确定性来自两方面：一是社会交往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技术和网络，而由于各种原因随时可能引起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问题，如黑客攻击导致网络瘫痪，引起经济政治等各种交往的中断；二是由于当代社会的信息运动、传播的技术基础和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交往的关联性、互动性、整体性增强，风险的传递效应不仅迅速，而且会更加放大，如一个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在传统社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它很可能造成社会某子系统以致整个社会系统的动荡甚至崩溃。

关于当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一些西方思想家已敏锐地关注到，他们所作的一些论述应当说很有启发意义。

贝克于1992年发表了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经典之作——《风险社会：走向一种新的现代性》，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他在该书中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正在从“工业社会”转向“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因素、个人主义日益明显、社会形态发生本质变化的社会。吉登斯强调全球化对于风险社会的影响：全球化及随之而来的风险社会，“带来了其他形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斯科特·拉什认为当代社会形式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风险文化”（参见俞可平，2003年a）。他说，“这一点与传统的社会结构不同。在传统的社会形态中还没有出现可以涉及全人类存亡的风险，传统社会形态所体现的是一种安全文化。而在未来的风险文化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技术资本主义各种门类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专业系统程序的日益复杂化，各个领域都存在危及全人类生存的混乱无序的不确定性，都存在危及全人类的巨大风险。人类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而不停地忙于改进和更新各种专业系统程序，忙于解决各种问题。可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各种问题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这就是风险文化时代，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和排除诸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飞速发展后所导致的包括生态风险、核风险在内的各种可以危及人类毁灭人类的巨大风险。”“这些始料不及的风险和危险将不再是由工业社会的物质化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和危险，而是从信息领域、从生物技术、从通讯和软件领域产生出的新的风险和危险，例如金融风险和各种危及人类生存的风险和危险等”。（拉什，第318-319页）。

当代社会的这种高关联性、高依赖性、传递效果的高效率和瞬时性，以及极度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昭示了当代社会的鲜明特征。

### （2）超民族国家的国际社会空间的扩大。

诸多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正冲击着传统的主权观念和国家治理方式，凸显了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性，这对世界政治和经济良好秩序的维护注入了新的活力因素。但同时，全球化和互联网对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治理理念和方式构成了挑战。鉴于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公民认同所构成的挑战，一些学者直接就把全球化的过程定义为“非民族国家化”的过程，认为全球化正在消除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日益消失，使民族国家的统治失效。这种“非民族国家化”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社会的非民族国家化，即经济的、生态的、文化的和军事的行为联系和作用联系的扩大，正迅速向前推进，而创建超民族国家的政治管理机构则是一个具有现实的重要性但进展却非常缓慢的进程。”（乌·贝克和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第162、171页，转引自俞可平，2003年b，第83、84页）更有一些学者指出，全球化破坏了国家的自主性，一个“社会的世界”正

在取代“国家的世界”，“民族国家正在终结”。（参见赫伯特·迪特根：《没有国界的世界》，转引自同上，第84页）詹姆斯·N. 罗西瑙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以边界迁移、权威重构、民族国家衰落和非政府组织(NGO)在地区、国家、国际和全球等诸层次上的激增为特征和标志的时代”。“在有必要不再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国家，而是承认要把大量非政府行为体作为重点分析对象的情况下，随之而来的应当就是不把国家当作第一位的，而是在以权威日益分流和等级化日益消失为特征的世界把它简单地看作一个重要的行为体。诚然，国家拥有主权，但是这些权力可以行使的范围正在一个相互依存和国家边界模糊的世界上日渐缩小。随着权威的加速分流，国家将不再可能在越来越复杂的挑战面前继续仰赖主权作为保护它们利益的基础。”（参见《面向本体论的全球治理》，转引自俞可平，2003年b，第84页）

以上有的观点显然过激和夸大，我们不能同意。但是在全球化成为不可超越的历史场景下，国家的职能、国家主权行使的方式以及如何处理国家主权与全球利益、国际社会的关系，的确是当今民族国家不能回避而是需要认真思考的新问题。

（3）从交往方式的变化看人的存在方式和境遇。

交往空间的扩大、交往节奏的加快和交往时间的节约，实质上意味着人的自由度的增加，使人迈向更自由的境界，从而使人获得了更大程度的解放。但借助网络实现的交往的不在场性和抽离性，使本来丰满的人性“虚拟化”，人性的感性光辉和温情日益失却和弱化，而人性的恶的方面则肆意释放，“天使”和“恶魔”互现成为当今人类存在状况的现实。

交往方式的变化不仅影响人性的实现程度，也意味着主体构建方式的不同。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认为，电子传播时代的交往实践构建了不稳定的、多重的和去中心化的分散的主体，而不同于“现代性或生产方式下”的“模式化实践”，后者促成的主体身份具有自律性和（工具）理性。（参见波斯特，第45页）印刷文化将个体构建为一个主体、一个对客体透明的主体、一个有稳定和固定身份的主体，而电子媒介交流系统的出现、传播网络的“去中心化”促成了个体的不稳定身份。波斯特还认为，在电子文化交流时代即信息方式时代，原来现代社会中由面对面的个体所组成的社群也将消失。在现代社会，一个由面对面的个体所组成的社群总是可以界定的，而电子交流系统的异军突起和广泛普及，“将敲响一切社群的丧钟”；“精神与身体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在进行翻天覆地的再构型，以至于如果还有什么社群形象的话，也只出现在科幻书籍和电影中”。（波斯特，第74页）

以信息通讯技术和现代化交通手段为基础的当代交往方式无疑是人类沟通和交往史上的巨大跃迁，是人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解放。然而也不能因此而看不到它对人的存在状况的影响。哈贝马斯就深刻指出技术理性的泛滥和对人的不断扩展，造成了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统治”，即“生活世界”的不断的技术化和体制化。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交往行动按一种非工具性原则运作，无须满足体制对诸如利润、控制和效率的那些强制性要求。（参见波斯特，第65页）看电影、听收音机、看电视、用电脑或传真机传递信息、打电话等等，都是对交往理性的贬损和践踏，都是体制对生活世界进行殖民的例证。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生活越来越几乎无孔不入地技术化、工具化和法律化，个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置于技术、管理规范、法律等外部强制性的要求、控制和监督中。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破坏了人际交往的正常、和谐状态，个人的自由空间不断被蚕食，社会-人文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生活世界的人文内涵变得日益薄弱。（参见哈贝马斯与哈勒，第182页）。

总之，全球化、信息化表面看来是资金、技术、产品等生产性要素（这些都可体现为信息）流动的地方，背后实际上是人及其社会关系的多因素互动，表明人的关系的网络化和丰富化。可以这样说，全球化、信息化是人类交往发展中的最新阶段，它表征着当代人类交往的新变化和新形态，即：交往的主体从单一化到多层次化、多样化和多维化，交往的对象从实体化转向信息化和虚拟化，交往的手段从机械化到电子化和智能化，交往的空间从地域化转向流动化和全球化，交往的内容从以经济贸易为主转向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科技、教育、人才等多方面的全面交往。当今社会是一个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稳定性和风险的“风险社会”，是一个民族国家主权正在削弱、“世界公共社会空间”日益增长的跨国社会。人的存在也正在日益成为“去中心化”、“去地域化”的“世界历史的人”，即“世界公民”。所有这些都显示出21世纪初人类交往的新形态，并表明着人类社会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巨变。由此，我们不禁要反省：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观念、体制和决策方式是否作出相应的调整了？

## 参考文献

- 阿达，雅克，2000年：《经济全球化》，何竞等译，中央编译局出版社。
- 贝尔，丹尼尔1984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栝等译，商务印书馆。
- 波斯特，马克，2001年：《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 伯努瓦，阿兰1998年：《面向全球化：全球化与世界》，王列、杨雪冬 编译，中央编译局出版社。
- 陈幼松，1999年：《数字地球——认识21世纪我们这颗地球》，载《百科知识》第1期。
- 陈筠泉、殷登祥主编，2000年：《新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科学出版社。
- 初濂龙平，2000年：《“全球化”的定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第6期。
- 德鲁克，P.，1999年：《后资本主义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
- 方舟子，1999年：《真实的数字化未来》，载《中华读书报》12月29日。
- 哈贝马斯，J.与哈勒，M.，2001年：《作为未来的过去》，章国锋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 卡斯特，曼纽尔，2001年：《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拉什，斯科特，2003年：《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载李惠彬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莫利，戴维等，2001年：《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童天湘，2000年：《高科技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汪向东，1998年：《信息化：中国21世纪的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杨宇光，1999年：《经济全球化中的跨国公司》，上海远东出版社。

叶江，1998年：《论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第1期。

俞可平，2003年a：《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西方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若干理论的评析》，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1期。

2003年b：“全球治理引论”，载李惠彬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余永定，2000年：《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载《国际经济评论》第1-2期。

张世鹏，2000年：《什么是全球化？》，载《欧洲》第1期。

张周，1999年：《电子商务向我们走来》，载《人民日报》5月12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责任编辑：鉴传今（《哲学研究》2003年第11期）